

# 晨钟长鸣：重返《晨报》的李大钊

肖宝荣<sup>1</sup> 杨飞洋<sup>2</sup>

(渭南师范学院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一生的奋斗历程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在李大钊的组织和协调下，《晨报副刊》的改良工作实现了从文艺竞舞之副刊到思想汇流之阵地的转变。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掀起十月革命研究热潮，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影响；中国革命

## Morning Bell Changming: Li Dazhao, who returns to the Morning Post

Xiao Baorong, Yang Feiyang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Shaanxi Weinan 714000)

**Abstract:** Li Dazhao, the pioneer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and one of the main foun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earliest disseminator of Marxism in China, his lifelong struggle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 the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Li Dazhao, the improvement work of the Morning Post Supplement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upplement of literary competition and dance to the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convergence. Under his influence and promotio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research upsurge was set off. A number of Chinese advanc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actively studied and spread Marxism, promoted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cause.

**Key words:** Li Dazhao; Marxism; influence; Chinese revolution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李大钊先生在国家衰微、民族危亡之际上下求索、大声疾呼，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实践作出了卓越贡献，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四大副刊”之一，《晨报副刊》在1919年2月重返《晨报》的李大钊手里焕发出独特光彩，成为除《新青年》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sup>[1]</sup>。在他的组织、协调和参与下，《晨报副刊》一洗民国初年报纸副刊普遍存在的封建保守之旧弊，在办报宗旨、栏目设置、版次规格和发行频次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良，打造出一块有目标、有组织、有系统的宣传阵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热潮的来临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营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 一、去弊与革新：改良文艺副刊的领袖

《晨报》的前身是《晨钟报》，本是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政客的机关报，于1916年8月15日创刊，刚从日本早稻田留学归来的李大钊受邀担任编辑部主任，并创作《〈晨钟〉之使命》作为发刊词。但囿于政见冲突，仅创刊两个月，李大钊就被迫辞职。1918年9月，《晨钟报》因刊登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大量借款消息而遭封禁。同年12月，《晨钟报》更名为《晨报》重新发行，实现复刊。1919年2月《晨报》第七版即《晨报副刊》改组，“吸收当时已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同志参加工作，明显地转而倾向新文化运动”<sup>[2]</sup>。《晨报副刊》的改良工作在李大钊的组织和协调下，实现了从文艺竞舞之副刊到思想汇流之阵地的转变。

一是重塑副刊的办报宗旨，增设新栏目。复刊前的《晨报》第七版虽异于民初一般小报副刊的艳俗之风，但也主要刊登小说、诗歌、游记、家庭常识等消遣内容，文娱性质显著。复刊后，《晨报》第七版主要由李大钊负责编辑。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晨报副刊》以广泛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sup>[3]</sup>为宗旨，在原有栏目设置的基础上又增设了“自由论坛”、“译丛”等专栏，为五四时期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创设了重要平台。此后不久，李大钊又帮助刊物增设了“马克思研究”、“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了诸多中外学人关于马克思生平事迹和基本理论的译介；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和《俄国革命纪念专号》，包括了诸多有关苏俄革命和中国工人阶

级研究的纪念文章。

二是打破传统的作者圈层，拢聚新生代。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阵地，《新青年》创办之初的撰稿人群体主要由以陈独秀为中心的皖籍知识分子构成，后期虽有变化，但尚未真正走出陈独秀的“朋友圈”。而《晨报副刊》的作者队伍则突破了因地缘人际关系聚合的旧圈层，主要依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普遍关注和认可而聚拢起来。据统计，自复刊以来，《晨报副刊》译介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共计138篇，其作者群体平均年龄26.5岁，大多是与李大钊有相同经历的留日教师和青年学生，且籍贯均匀分布于全国13个省份。<sup>[4][5]</sup>通过对《晨报副刊》文本作者的社会关系考察，可以窥见李大钊“处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人事谱系的中间位置”<sup>[5][34]</sup>。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具备初步共产主义信仰的青年知识分子汇聚在《晨报副刊》周围，通过翻译国外著作、刊发研究成果、开展学术会晤等形式向国人有选择、有目的地推介马克思主义。

三是依托《晨报》的固有优势，声援《新青年》。《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前、中期最出色的宣传窗口，获得了大量读者的青睐。但伴随国内外形势发展和斗争现实需要，以月刊形式发行的《新青年》受限于出版周期过长，难以满足当时社会对理论传播的迫切需要，必须开辟新的宣传阵地。陈独秀、李大钊因此创办了《每周评论》，以议论时政为主，但仍受限于周期、内容、发行网络等问题。而《晨报》作为一张发展成熟的日报，有着发行网络完善、读者群体庞大、社会接受度高等优势，自然成为最适合解决陈、李等人燃眉之急的舆论阵地。恰逢李大钊再度受邀从事《晨报》第七版的编辑工作，在他的居中协调下，《晨报副刊》与《新青年》、《每周评论》密切关联、相互呼应，形成民国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传媒矩阵”。例如，李大钊的《劳动教育问题》、《新旧思潮之激战》、《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等文章就在三家报刊上先后转载，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

### 二、译介与研究：传播马列主义的先驱

尽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但囿于当时中文译著缺少，难以开展深入阅读和研究，整体仍处于“雾里看花”的认知阶段，严重阻塞

了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传播。面对困难,李大钊作为先驱和“旗手”自然当仁不让。在他的主持和参与下,《晨报副刊》刊发了大量译介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本,尤其是诸多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专著被引进,使许多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实现了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转变,推动当时的思想启蒙进入了新阶段。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晨报副刊》成为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

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译介与研究。《晨报副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介绍中,影响最大、获认可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时任《晨报》总编的陈博贤在李大钊影响下,以“渊泉”为笔名,在1919年5月5日至8日的“马克思研究”专栏译载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地位、基本特征、社会组织变迁及动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内容,虽稍显粗糲,但却开启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同年,堺利彦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和贺川丰彦的《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等文也译载于该专栏,使读者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此外,李大钊也亲笔撰写了《劳动教育问题》等文,以阶级斗争视角论析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呼吁应该为劳工争取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是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回应社会现实的范例。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译介与研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态势业已摆脱世纪之交的粗陋,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开始萌生,<sup>[6]</sup>在李大钊的组织下,《晨报副刊》成为推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沿阵地。“食力”翻译了河上肇的《劳动与资本》,刊载于1919年5月5日至31日的“马克思研究”专栏,较全面地展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和基本观点。同年6月,陈博贤又将高富素之翻译的考茨基《马氏资本论释义》译为中文,以三编的篇幅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与资本所得等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此外,李大钊将1922年2月的一次演讲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为题刊载于《晨报》,比较性地阐述了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的相关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财富增值的秘密,在理论上应和了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的工人运动。

三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译介与研究。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也激发了国人对欧洲、苏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趣。李大钊依托《晨报副刊》就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宣传。他以“去闇”为笔名<sup>[7]</sup>,翻译了日本学者安部矶雄的《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行动》,分38节刊载于1918年12月至次年1月,共计41日,较为系统地向读者介绍了英、法、德、奥、意、俄等欧洲国家社会党运动的历史及其主张。之后,安部矶雄《战争中社会党的态度》、托洛斯基《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也相继被不同译者译载于《晨报副刊》。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推介是社会主义运动宣传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刊发了诸多阐发其对中国革命启示的文本。仅李大钊就相继发表了《战后之世界潮流》、《新旧思想之激战》、《马克思与第一国际》、《青年与农村》、《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等多篇文章,带动《晨报副刊》掀起十月革命研究热潮,极大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

### 三、批驳与引领:荡涤思想杂流的斗士

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正处于众声喧哗的阶段,各种思潮与主义竞相涌现,相互论争,未能角出最终胜负。当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是迷惘矛盾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部分青年领袖也还未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想要争取广大青年并确立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就必须要在思想领域的激烈交锋中取胜。在李大钊重返《晨报》后,尽管《晨报副刊》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之一,但许多论述非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得以刊行。面对“乱云飞渡”的思想大潮,李大钊在比较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领导了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驳,拓宽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空间。

一是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无政府主义虽然最初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被引介到中国,但本质上却属于小资产阶级性的社会思潮。自1919年起,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人为捍卫理论阵地,主动向马克思主义学说发起进攻。在陈独秀、李大钊的

组织下,马克思主义者正式打响反击。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质疑,李大钊等人从无政府主义国家的性质、职能和革命阶段划分等方面给予回应;针对无政府主义主张的绝对自由,李大钊在《自由与秩序》一文中进行了直接批驳,提出个人与社会是“同一事实的两个方面”,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未来社会应当实行按需分配体制,李大钊等人直接驳斥其想法不切实际,应当实行按劳分配。与此同时,《晨报副刊》也刊载了《俄国式革命的由来》、《何为无政府主义》、《蒲鲁东》、《论无政府主义》、《梁乔山先生致某君书》等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帮助读者在比较中逐渐辨析清楚两种思想的本质区别,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1920年10月,公开倡导“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张申府等人邀请访华。为迎接文化盛事,《晨报》提前半年进行预热。例如,张申府于《晨报》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致罗素》,介绍其人其论;《晨报副刊》连载罗素《社会改造原理》长达四个月。李大钊对刚访问过苏俄的罗素也充满期待,以期获得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证。然而罗素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本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主义,且他在华的访谈中抨击了苏俄体制和布尔什维克党,直言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不可能实现,主张发展教育和实业。罗素的相关言论被梁启超、张东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利用,趁机发表《由内地旅游而得之又一教训》、《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主张中国首要应当发展资本主义,论战就此挑起。李大钊相继抛出《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等文给予回应,从唯物史观、世界革命、中国国情和苏俄实证等维度展开批驳,提出了诸多创造性见解,为真假社会主义的区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爱国传单被捕,胡适接任《每周评论》编辑工作,并于7月20日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改造社会的路径应当是循序渐进的改良而非暴力革命,挑起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里的“主义”事实上指向了陈、李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回乡避难的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从唯物史观出发阐明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主张,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割,驳斥了改良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偏见。胡适继而抛出《三论问题与主义》阐明观点,给予回击。同年8月31日,《每周评论》遭北洋政府封禁,“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面上得以平息。这场论战中,《晨报副刊》看似置身事外,事实上却扮演了关键角色。据统计,仅在7月20日至8月31日的论战中,《晨报副刊》就刊载了《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各国社会党之情形及社会主义之概论》、《劳动问题之研究》等6篇推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本,有力地响应了李大钊的批驳行动,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

### 参考文献:

- [1] 王宪明,杨琥.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5(04):120.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78:98.
- [3]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M].银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71.
- [4][5] 耿春亮.《晨报副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1926)[D].清华大学,2015.
- [6] 顾海良.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回溯[J].理论导报,2021(06):26.
- [7] 杨琥.《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J].历史研究,2009(03):173.

### 作者简介:

肖宝荣(1991.3)女,汉,陕西咸阳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杨飞洋(1993-3-),男,汉,山西运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